

西北文史薈說

趙石題



西北文史荟览

主 编：徐梦麟

副主编：张培礼（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张思温（甘肃省文史研究馆）

王绍坤（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鱼闻诗（西安市文史研究馆）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国发（1988）57号文件精神，以适应全国各文史研究馆的工作交流和协作，应逐渐转入文史研究领域的情况。1989年第二次西北地区文史研究馆工作交流会在新疆召开会上协商决定编辑出版《西北文史荟览》一书。此次会议纪要中提出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牵头，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及西安市等馆各自征集、编写馆员的诗、文稿件。由宁夏馆编纂。1990年在宁夏召开的第三次协作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编辑这两本书的有关问题，并写出了纪要。两年多来，经过共同努力，通力合作，《西北文史荟览》与诗集《丝路清韵》一起问世。在这里我特向所有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敬意。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同志于1990年来宁夏考察时说“馆际间的横向联系和协作，是文史

研究馆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西北文史荟览》的问世，仅仅是这种协作的开始，今后更多的研究工作，将需要我们进一步协作，方能结出硕果。但愿我们继续下去，努力不懈。

西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地，在这一地区，文化宝藏极为丰富，只要我们努力挖掘，必然会获得可喜的成果。

西北各地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大多是德高望重、饱学多才之士。本书的一些作者多为耄耋之老和部分知名学者。我反复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深感内容丰富，博采精深，敬慕之意，久久萦绕于怀。我想，本书的出版，对西北地区文史之研究，定会有所裨益。

徐梦麟

1991.5.25

目 录

前 言	徐梦麟 (1)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关中东部秦汉唐时期四大水利工程	
遗迹考辨	王重九 (3)
谈李自成行宫问题	常进南 (18)
范仲淹知延州	张培礼 (24)
安丙抗金事迹述略	陈显远 (46)
清同治西北回民起义概述	高 泽 (54)
西安基督教的过去和现在	李因信 (82)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	
李自成起义与甘肃	师 纶 (95)
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在甘肃的影响	张令瑄 (110)
会州考	张尚瀛 (130)
甘肃河西五凉政权兴亡简史	赵世英 (140)
(附西秦)	

○宁夏文史研究馆○

- 东汉时期的羌人起义……………曾文俊(169)
- 赵尚仁及其游贺兰山遗诗十九首……………孙鸿书(192)
- 西夏的外戚专权……………王绍坤(205)
- 民国期间宁夏水利……………李景牧(220)
- 漫谈《抗日周刊》……………苏复涛(235)
- 回族与伊斯兰教……………马辰(246)

○西安市文史研究馆○

- 西安新闻事业发展史略……………陈小波(257)
-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
地区的传播路线与传播概况……………马士年(281)
-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回族的形成
……………马士年(299)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关于东部秦汉唐时期四大

水利工程遗迹考辨

王 重 九

关中东部水利工程，在古代以秦、汉、唐时期为最盛。早如秦、汉的郑国、龙首二渠，后如唐代姜师度的堰黄、引洛，徒以为时久远，遗迹多就湮没，即在有关文献中，或以为辞过简，或以记载抵牾，致使后来学者，在论著引述中，难免发生错失。笔者居近其地，略悉乡邦文献，重以亲身勘察，愿就所得，粗予考辨，推其致误根由，以求正于方家。

一、秦郑国渠究在何处入洛

“郑国渠”简称“郑渠”，创建于秦王嬴政元年至十年（公元前246—前237）。据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凿泾水，自仲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是渠之首尾、走向和长度，原极明悉。但东端究竟从

何处入洛，却有不同说法。一说从蒲城县东南铃钊公社晋城村东南入洛，东岸为今大荔县冯村乡船舍村，这是完全正确的；一说在今白水县东北注入洛水，却是完全错误的。推其原因，实与迄今流行的酈道元《水经·沮水注》有关，为便说明问题，现特抄引如下：

（沮水）东南注郑渠。沮循郑渠，东径当道城南，又东迳莲勺县故城北，沮水又东径汉兴武故城北，又东径栗邑县故城北，东北流，注于洛水矣。

按沮水原由耀县流入富平，先与漆水会合，名曰石川河，南流注入渭河。修建郑国渠时，截沮入渠，以增大水力，文中所谓“沮（水）”、“东迳”云云，实指渠水而言。“莲勺故城”，过去学者都认为在今白水县西北28里，近得王国维《水经注校》，对这一点只校而不疏，而著名的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却疏而不精；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即依以绘制，能无所失。正如历史学家杨宽同志所云：“郑国渠故道淤塞，关于它的流经路线，存在不同的说法。杨守敬《嬴秦郡县图》和《前汉地理图》所绘郑渠，从今泾阳、三原、高陵以北，转而折向东

北，过蒲城、白水以西，从白水以北注入洛水。这是不符合地理形势的。蒲城、白水远比泾阳、三原、高陵为高，渠水不可能由低处流向高处。”^①立论确切，无可怀疑。原来郑渠所经，是西高而东低，海拔差距约100米左右。

若依上述郦《注》、杨《图》，是郑国渠自栎阳（今临潼县东北武家屯附近）以东并不“并北山，东注洛”，而是转而上北山，拔高三、四百米，然后绕过白水县西北二十八里处的“栗邑县故城北，东北流，注于洛水”；结果，不是“三百余里”，而将是五百余里。不仅如此，自杨《图》问世以后，直到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公开出版之初，有关史书插图，没不以杨《图》为依据，以讹传讹，殆误极为深远。

首先，“栗邑县”置于汉景帝，废于后魏。《元和郡县志》谓：“故城在白水县西北28里。”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析栎阳县东部置平陵县，第二年，改名为栗邑县，太宗贞观八年（634），降县为栗邑镇，并入栎阳，在临潼东北石川河东岸，俗名栗邑庙。其所以改名栗邑，决非袭用白水县“栗县”之旧名，尝疑原平陵县城

所在，即名粟邑，此由祖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加上种种原因，一县之内，即有同名村庄，况于外县，似可推想而知，且由唐初沿用至今不变，也可作为旁证。

其次，酈道元既为伟大的古代历史地理学者，在注《水经》时，不会不知郑渠流经的地势高低，而铸“东迳粟邑县故城北”的大错。今酈《注》原书虽不可复见，但经千数百年的传抄翻印，残讹错衍，例所难免。粗检王国维《水经注校》，即可见其一斑。即远自明朝到现在，虽有不少学者潜心钻研，并已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但对其存在的所有问题，尚未能一一解决。尝疑今本《水经·沮水注》中“粟邑县”的“县”字，实为后人在传抄时所衍入。若于《注》中删去“县”字，则郑渠不上北山而“并北山，东注洛”，言从理顺，不仅解决这一悬之久久的老大难问题，更可纠正杨守敬《水经注疏》和秦、汉两《图》之失误。

二、汉龙首渠并未修成溉田

汉代龙首渠创始于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据《史记·河渠书》记载：

庄熊黑言：“临晋（即今大荔县）民愿穿洛溉重泉（即今薄城县）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徵（今澄城县）引洛至商颜山（即今铁镰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短短百余字，叙述清楚，有头有尾。无奈后人不察，反生种种误解：

1. 1973年夏，笔者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展室，见到“秦汉关中水利示意图”模型，错误有两点：第一，所有井位，本应按渠道由北—南走向标出，它却是由西向东标出于商颜山脊上；第二，该模型又从原渠仅仅“颇通”的南口义井（原名泥井）村向西南划一弧线，引“渠水”至今大荔县西仍入洛河，弧线与洛河之间且标示有灌溉亩数。询之有关导引同志，亦不知有何根据^②。2. 在陕西省博物馆第一展室《秦汉关中水利示意图》上，却由商颜山南往东南方向画一弧线，直指原朝邑县城南洛河由东自南拐弯

处，用以标示龙骨渠的走向，也不知有何依据？

3. 数年以前，曾见李天文等同志《龙首渠考证》

（油印本）一文，认为龙首渠在当时不但修成溉田，并言该渠从义井村向东流经西、中、东三个汉村十余里，且到东渠头村折而向南，退余水于洛河，并以现存于原大荔、朝邑界上的“干河”

（详见下文）为证。4. 近有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以此见问，或言司马迁写《史记·河渠书》时，“犹未得其饶”，难保司马迁书后未必“未得其饶”？似亦有理。5. 新版《辞海》在“龙首渠”条下，瑜瑕互见，至谓“至唐仅存尾间一段，称为‘干坑’，成为大荔、薄城三县界沟。即今人民引洛渠的前身”，实属似是而非。6. 还有一说，即既云“修成”，又谓“失败”，却引“渠水”向南入洛。似受《考证》之影响。

综以上六例，足见纷纭。揆其原由，除就书论书，于不解处断以臆脱之外，主在多未亲至其地，或曾亲至其地，却未作深入的实际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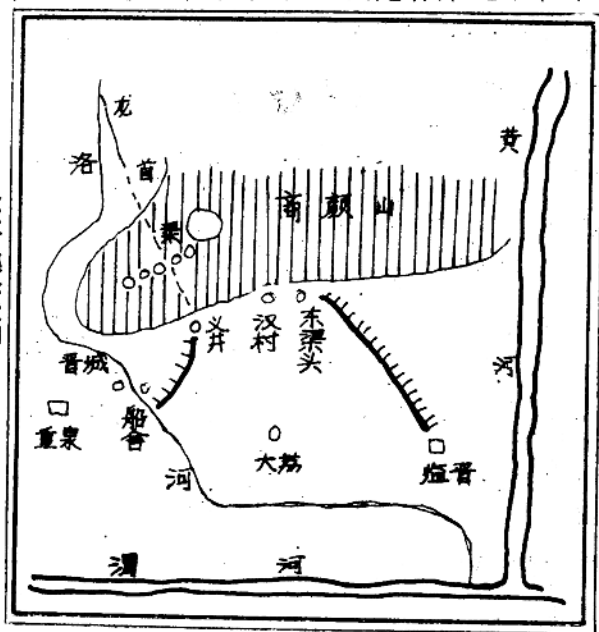
按“龙首渠”工程，实进行于汉武帝元狩至元封十余年间（前122—前105）。司马迁既言“井渠之生自此始”，著名史学家王国维业已证之于后。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

里说：“‘井渠’始于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技法传至西域，所掘即今日之‘坎儿井’。”且司马迁家在韩城，官于长安，往来临晋（今大荔县），闻见的切，其笔之于书，为时实在工停之后，所作结论是“渠颇通”，而不是“渠畅通”，尤其是“犹未得其饶”，更足证其并未溉田。再看，晚于司马迁百余年的陕西另一著名史学家班固（32—92）在所著《汉书·沟洫志》里，仅仅照抄《河渠书》原文，若已修成溉田，岂能不补写进去？何况距今三百年前，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輿纪要》里，于抄引司马迁“龙首渠”原文之后，紧接着即写出“后遂废”^③三个字，却同样未被后来研讨者所重视。所谓“十余里”，实指穿过商颜山而言，并非渠水东流十余里；渠既未成，何来“尾閼”？更不会“成为今大荔、蒲城二县界沟”；今“人民引洛渠”已改用旧名“洛惠渠”，若称汉龙首渠为其“前身”，如仅指穿过商颜山一点则近之，如指山南灌区，则两者毫无关系，因在开凿洛惠渠所有干、支渠时，从未发现任何汉代工程遗迹。至于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春正月壬寅”虽有于“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④之说，按

诸当日实际，只不过“纸上谈兵”，毫不足信。

关于上引《龙首渠考证》中所谓“东渠头”即汉龙首渠东流拐而向南之处，亦属失误。实际上是当地由商颜山麓流出三道泉水，积久冲刷成渠，其方位不同，遂有“东渠头”、“西渠头”和“北渠头”之名，若以“东渠头”为龙首渠东流遗迹，则西、北二渠头又将何说？至于所谓退水道的“干河”，于今尚在，但它为唐代“引洛”灌“通灵陂”的遗迹，和汉代龙首渠绝不相干。

汉龙首渠示意图



三、唐代姜师度引洛灌通灵陂和 堰黄河灌河滩弃地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姜师度调任同州刺史，曾于今大荔县境内兴建两大水利工程，收效甚宏。但遗憾的是，在两《唐书》记载里，却存在严重的失误和矛盾。为了便于考辨清楚，解决问题，先将有关原文照抄如下：

《旧唐书·姜师度传》：“再迁同州刺史，又于朝邑、西河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及堰黄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十余屯，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寻迁将作大匠。”（卷一八五下）

《新唐书·姜师度传》：“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西河二县，淤河以灌通陂，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帝幸长春宫，嘉其功，下诏褒美：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进将作大匠。”（卷一百）

首按，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分合阳县置河西县，县治在今合阳县城东南40里的夏阳镇，初属西韩州；太宗贞观八年（634），改隶同州，南接朝邑，两县东部，滨临黄河，河滩平坦，北